

所探的路也就很狭窄、很有限,只是某一方面的某些问题,说不上宽广,更说不上在宽广的范围里为比较重要的问题理清眉目。这本集子是一小册真正意义的初学集。”他还说:“这本初学集只是我们研究问题的开始。发表这本初学集,并不是我们已经得到什么可以自信的结论,而是把我们的设想,把我们试图为之努力的研究方向,通过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探索,提出来就正于读者。”^①这些话体现了一个严肃学者的谦虚精神,但也是实事求是的。

世界史学科目前还处在它的幼年时期。由于这门学科的内容异常丰富,异常复杂,要使它成熟起来,还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这个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今天中青年学者的身上。他们未来的成就一定也应当超过前人,但先驱者的筚路蓝缕之功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纪念中国世界史学大师吴于廑先生

朱 寰

今年是中国世界史学大师吴于廑先生诞辰 100 周年纪念。由于两部《世界史》编纂工作的关系,我曾与先生相处多年。先生的大师风范,始终活在我们的心里。先生道德高尚,学识渊博,永远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楷模。我终生难忘与先生紧密相处的日日月月。我虽没有那么幸运,投身于先生门下,但几十年来一直视先生为自己的恩师。先生的指导和教诲,受益匪浅,惠及终生。先生之德,高山仰止;先生之教,化雨春风。

回想起来,吴先生的大名早为学界所景仰。20 世纪 50 年代,郭守田先生在世界史的一次会议上说,解放前我国公费派遣出国留学,多半都是去美国哈佛大学学习。“中国的哈佛大学留学生中历史学方面有‘前三杰’和‘后三杰’:20 年代的前三杰是陈寅恪、吴宓和汤用彤;40 年代的后三杰是吴于廑、杨联陞和任华。”我想这些学术名人,只能慕名而不能谋面,实属憾事。

说也凑巧,党中央宣传部为了总结建国十年来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高校教材建设的经验和成就,决定组织全国力量重新编写高校教材。国家教育部指定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武汉大学吴于廑教授为《世界通史》总主编,另由各大学抽调一部分编者在周、吴二位主编领导下参加编纂工作。我有幸参加了这部教材中古分册的编纂工作,从而在 1960—1961 年间,有机会与吴于廑先生直接接触,有问题当面请教,聆听先生的亲切教诲。这两年我切身感到受益良多。

首先,我想谈谈对吴先生世界史观的理解。旧中国在历史学科中没有世界史,除中国史之外,只有英国史、美国史、法国史、日本史等国别史,或是东洋史、西洋史等地区史,或是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专门史。大学里根本不开世界史课。新中国建国后,各大学基本上都开设了《世界史》课。究竟什么是世界史?当时许多人弄不清楚。教《世界史》的教师都希望能有一个科学的认识。特别是在编写《世界通史》时,更需要解决这个问题。1960 年夏《世界通史》编写组在北京饭店召集国内数十名专家学者,讨论《世界史》教材大纲和教材初稿。会上关于世界史的定义就有很大分歧。有的说:“《世界史》就是本国史以外的其它国家的历史”;有的说:“《世界史》就是各地区史的综合,各大洲的历史加到一起,就是整个世界史”。这些意见是否正确,一时难以判断,但似乎没有反映世界史问题的本质。会后我去察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想知道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史问题的基本观点。结果查到了几条:其中有一条,感到难以理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②。马克思这句话理论深奥,需要认真研究!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那么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存在?而世界史又是结果,是什么结果?我总是想不太明白,对世界史的本质认识不清。

^①《自选集》,第 543~546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 页。

《世界通史》教材讨论会结束后,教材的总主编和分册主编全部迁到高级党校,进一步修订教材。大家住在一起,每人一个工作室,讨论和研究问题比较方便。于是我将存在的疑问提出,向吴先生请教。先生看过马克思原著后对我说:“历史学是研究什么的?是研究已经过去的社会。今天的社会是现实,到了明天这个社会现实就变成历史。有今天的现实社会才有明天的社会历史。有国家民族范围的现实社会,才有国家史和民族史。一定地区内的国家和民族的社会,通过彼此交往和交流,逐渐联系密切,从而形成地区史,如东亚史、南亚史、欧洲史等,地区是局部世界,也可以称为局部世界史。人类社会在早期阶段(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因为人有自然发生的依赖关系,生产力水平低下,相互联系只能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生,不可能形成整体世界,因而也就不可能存在整体世界史。所以马克思这句话的上半句是说,真正的统一整体的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下半句是说,作为整体世界史学所反映的历史实际,是整个世界经济、政治、科学、文化不断发展的结果。通过现代化的大生产,世界上所有民族联系加强了,才能逐步形成统一整体,成为整体世界史学产生的客观基础”。吴先生还提醒我,仔细看看马克思著作中这个括号内最前面的一个词组“交通工具的影响”。这就是说,世界很大,既有大陆山川,又有海洋岛屿,如果交通工具不发达,没有车船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人们无法与远方的人们进行交往和交流,自然不可能形成整体世界的历史。吴先生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终生难忘。

这就是说,世界史是整体世界的历史,不是局部世界的历史。整体世界有一个形成过程;世界史学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各种不同地区史、专门史等,都是整体世界史的不同发展阶段。例如,希罗多德的《历史》(希腊地区史),波里比阿的《历史》(罗马地区史),司马迁的《史记》(自称为“天下史”,实际是秦汉之际的中国地区史),兰克编的《世界通史》,威廉士编纂的《史学家的世界历史》,《剑桥三史》等等,都属于或大或小的局部世界史。没有逐步扩大的局部世界史也就不可能有整体世界史。整体世界史既不是地区史的相加,更不是国别史的堆砌,而是世界上的人类,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才能形成整体世界。所以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整体世界历史也是一样,不可能一蹴而就。

其次,我想谈对吴先生治学态度的理解。我是在1951年厦门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世界史教学工作的,当时国家尚未实行研究生制度。接触吴先生后,我想默默地视吴先生为自己的导师,既可公开请教学问,又可观摩学习其治学和为人。天赐良机,千载难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经过两年多的耳濡目染和有心观察,我非常钦佩吴先生的治学:勤奋刻苦,严谨求实,广涉精思,一丝不苟。

在《世界通史》教材编纂过程中,吴先生要求从大纲的框架结构到内容的思想观点,从资料选择到文字表述,全都要仔细推敲,精雕细刻。哪怕有一点小小的疑窦,也要去大图书馆认真查对核实。有的需要查外文书,有的需要查中文古籍,有的需要检索中外文期刊。因而我们经常跑北京大学图书馆或国家图书馆。每次去图书馆,吴先生都不许我给他搭出租车,而是主动去乘公共汽车。其勤俭刻苦朴实的作风,可见一斑。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事先写在笔记本上,进入图书馆后就争分夺秒,手不释卷。每次去图书馆大致总需要两三个小时。例如,在修改中古部分阿拉伯帝国一章时,对其极盛时期的租赋收入数字产生怀疑,为此曾专门跑北京大学图书馆解决。为了赶进度,我们主编组从来未休过星期日和节假日。当时适逢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和蔬菜供应不足,早点常以菠菜根制成的咸菜佐餐。晚餐开得早,夜间工作时间长,就寝时已饥肠辘辘。生活虽比较艰苦,但无人叫苦。大家总是精神饱满,干劲十足,全身心地投在《通史》上。

吴先生哲学修养水平高,思维能力强,头脑清晰,思路敏捷。讨论问题,抓住关键,一语中的。研究世界史也特别需要哲学思维。先生曾说过,世界上各地区、各部分联系的加强主要是靠彼此间的经济交流,以及相互之间的政治和文化交往。通过彼此交往和交流,相互学习,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提高。吴先生有专文论述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的交往和交流,促进各自社会的进步。公元4—5世纪,亚欧大陆上的游牧和半游牧民族,自东徂西,进行大规模的迁徙,向农耕世界进攻。于是在西欧出现了许多新型的蛮族国家。这些国家虽在希腊罗马的故地兴起,但他们并不通古希腊罗马的语言文字,也没有研究希腊罗马文明的需求。因此古希腊罗马的文明在欧洲被埋没了近千年,故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

在7世纪前期,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从阿拉伯半岛兴起,然后向东方和西方扩张。200年后在东方到达了中国和印度的西部边界;在西方经过西亚北非,跨过直布罗陀海峡,直至西班牙半岛。于是阿拉伯人在亚洲西部、非洲北部和欧洲西南部建立起一个庞大的阿拉伯伊斯兰教帝国。这个大帝国基本上从9世纪初起,逐渐掀起一个主要是翻译希腊(也包括少部分罗马和波斯)著作和典籍的运动,即“百年翻译运动”。希腊的哲学、文学、社会、经济、历史、天文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等许多重要著述和典籍,都翻译成阿拉伯文本,并根据阿拉伯人的理解,加上注释。古代希腊罗马和波斯的著作与文献典籍,有些在中世纪欧洲的战乱中遗失,不得不从阿拉伯文译本重新引进西方。因此阿拉伯人的翻译运动对西欧文艺复兴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吴先生要查明阿拉伯人最著名的四大翻译家的名字及其译著,最终在国家图书馆解决。原来四大翻译家是侯奈因·本·易斯哈格(809—877年)、阿尔·法拉比(870—951年)、伊本·西那(阿维森纳,980—1039年)、伊本·路西德(阿威罗伊,1126—1198年)。

再次,谈谈我对吴先生的为人和为师之道的理解。我通过参与编写两部世界史教材(周吴本和吴齐本),与吴先生相处的机会增多。我对吴先生的认识和尊敬也与时俱进。我认为先生在为人方面是爱国、爱人民,思想道德高尚的人。在待人方面是与人为善,诲人不倦,为祖国教育事业尽心竭力,无怨无悔。吴先生做人处事,都是非常谦虚谨慎,表现出一位大学者的儒雅风范。

新中国建国之初,党中央提出“向苏联学习”的口号。吴先生对我们编书的同志们说:我们编纂《世界通史》,学习苏联是应该的,但要科学正确地学习,有分析地学习,不能教条地照搬苏联教材。大家研究了学习苏联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一)在史观上应从世界上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不受国家、民族和地区狭隘利益的局限。要注意摒弃苏联世界史中“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观点,树立正确的辩证唯物史观。(二)要注意世界上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之间在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和交流,逐渐克服孤立分散的状态而连接成为一个整体的历史。(三)中国人编纂的世界史应注意反映中国特色,例如,张骞通西域、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匈奴西迁、唐朝时期的国际交往、郑和下西洋等等,都反映中国在世界历史上东西方交流和交往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大大小小的局部世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演进,最终必然连接成为统一整体。

吴先生最终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和世界史学科建设而献身,这种伟大精神,实令晚辈衷心铭刻,永世不忘!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教育部委托吴于廑和齐世荣二位先生,重新主编一部包括中国史在内的完整的《世界史》。北京大学马克垚教授和我主持中古史分册的具体工作。1992年新年假期过后,我在天津254医院做了前列腺摘除手术。2月春节过后接到武汉大学发来的为吴于廑先生庆贺80大寿举行学术讨论会的通知。我回信说,刚做完外科手术,如果身体恢复得快,一定出席;若是身体欠佳,恐难远行。吴先生得到信息后,立即亲笔给我写了一封回信,询问我的病情和手术情况,问寒问暖,关怀备至,字里行间,透露出渴望会面的情谊。我给吴先生立即回信,表示一定出席这次盛会。四月间武汉大学按照预定计划开会。先是给吴先生庆贺80大寿的祝寿会和宴会,次日上午为吴先生学术思想讨论会;下午为吴先生博士研究生答辩会;再次日为《世界史》编写组成员学术问题讨论会。四个会议按计划连续进行,先生正在发言谈《世界史》教材各段的衔接时突发了脑溢血症。我坐在条桌吴先生对面,只见他面部和全身抽搐起来,眼睛向上翻白,忽然倒在座椅上。我们急忙上前搀扶,召请医生,虽经抢救,但已无力回天。一代宗师吴于廑先生就这样驾鹤西去了,我们痛心疾首,心如刀绞!我与吴先生相处的往事,一幕幕地浮现在脑际,对先生的为人、为学、为师,处处都充满了敬意。失去这位良师益友,痛惜万分,永世缅怀!